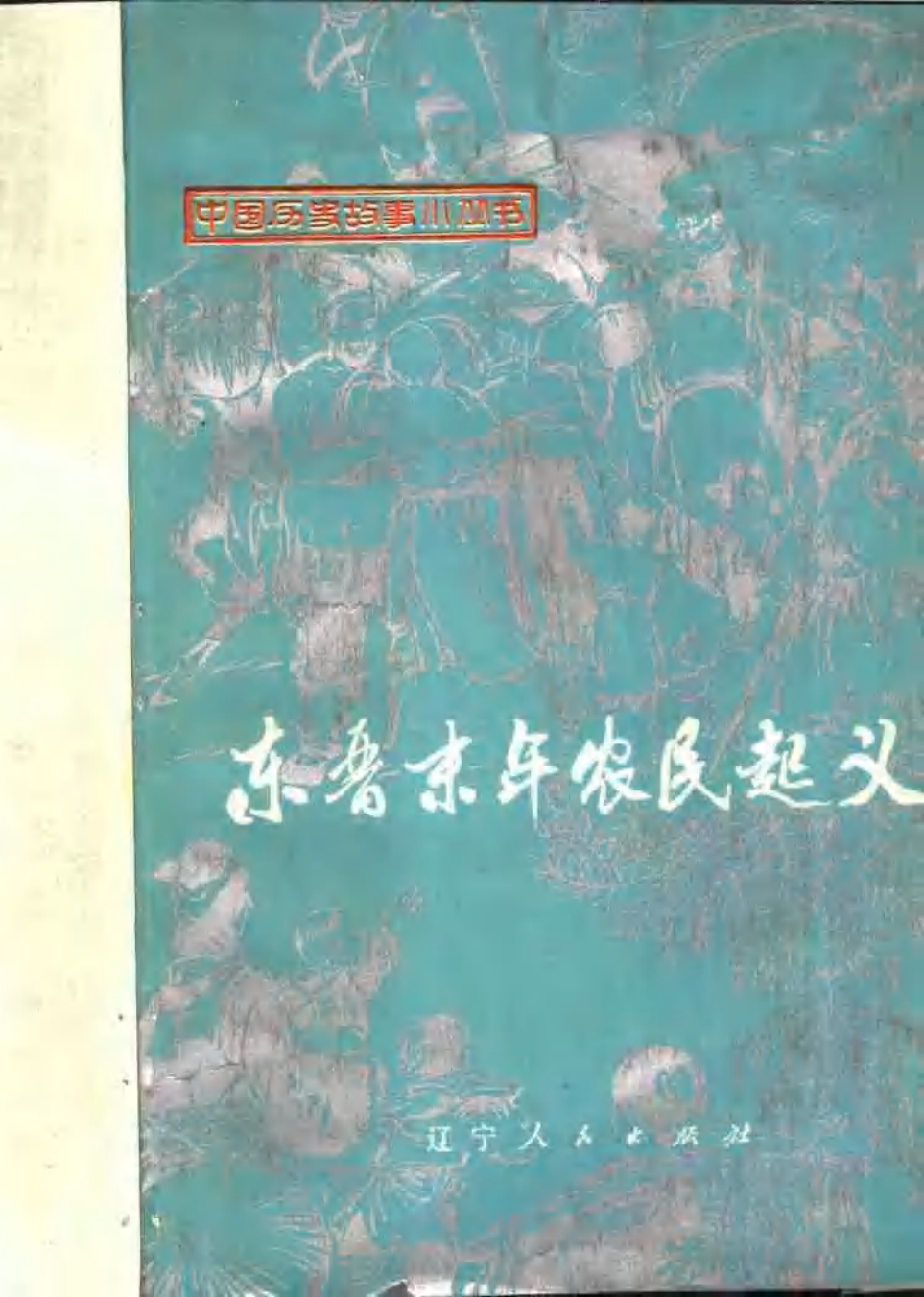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故事丛书

东晋末年农民起义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东晋末年农民起义

抚顺钢厂三炼车间历史研究小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沈阳

东晋末年农民起义

抚顺钢厂三炼车间历史研究小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1/2

字数: 45,000 印数: 1—20,000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90·411 定价: 0.13元

毛主席语录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目 录

- 一、东晋世家豪族的腐朽统治..... 2
- 二、革命烈火，燃遍江南.....12
- 三、坚持斗争，转战南方各地.....24
- 四、悲壮的结局，深刻的教训.....38
- 五、历史功绩，永垂不朽.....46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雄伟的钱塘江，一泻千里，奔腾入海。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汹涌澎湃。祖国的江南，这一片富饶秀丽的鱼米之乡，是在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开发出来的。孙恩等人领导的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就是发生在江南地区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斗争。

公元三九九年，在地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下，江南地区几十万农民揭竿而起，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纵横于汪洋大海之中，转战南方各地，前后经历了十二年之久。这场伟大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震撼了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从而推动了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谱写出一曲胜利的凯歌。了解这段革命历史，对于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正确认识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东晋世家豪族的腐朽统治

西晋灭亡后，晋朝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南逃的北方豪门大族和南方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东晋政权。东晋政权沿袭了西晋时期的世族门阀制度，腐朽无能的世家豪族操纵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军政大权，政治非常腐败，门阀士族势力更加强大。他们争权夺势，矛盾重重，互相攻伐，战祸连连，人民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世家豪族门阀势力是依靠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发展起来的。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的继续发展，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他们的腐朽统治。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就是继西汉末年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之后又一次以反抗世家豪族腐朽统治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

世家豪族，就是指那些世代作高官的豪门大族。他们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的上层政治代表，是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权统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自从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

兼并日趋严重，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在地方上称王称霸的豪强大地主。西汉后期汉元帝以后，由于农民和地主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高统治者信用儒生，改变了汉初以来长期推行的法家路线，政治日趋腐败，政权落在豪强大地主出身的官僚贵族王氏家族手中，这是豪强势力控制政权的开端。东汉建立以后，极力扶植豪强大族，给予他们以各项政治经济特权，促使豪强势力更加恶性膨胀。这些出身豪门的官僚贵族，除了依仗权势兼并土地，把破产农民变为受其奴役的依附农民（当时佃种豪强地主土地的农民，没有人身自由，和豪强地主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建立起“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即依附农民）万计”的封建大地主所有制田庄和进行武装割据的据点“坞壁”而外，还把持朝廷选举官吏的用人权，拉拢一伙亲信官吏（当时称为“门生”、“故吏”）结党营私，结成一股以庞大的封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势力。他们的子弟也是凭借这种特权地位步步高升，飞黄腾达。这样，在豪强大地主中就出现不少世代作公卿、势力最显赫的世家豪族，世族（由于世家豪族提倡尊孔读经，披着精通儒术的外衣，所以又被称为“士族”）门阀制度就是在东汉时代开始产生

的。

两晋（西晋、东晋）时代是世族门阀制度的极盛时期。经过东汉末年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到了三国时代，法家路线曾经一度占据着统治地位，世族门阀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但到了三国后期曹魏统治者没有坚持曹操的法家路线，政权落在世族代表人物司马懿父子手中，建立起以世族门阀势力为核心的西晋政权。西晋王朝在夺取政权之初，就采取了一些恢复和扩大世家豪族政治经济特权的措施。统一全国后，进一步用法权形式把这些特权固定下来：一方面，把曹魏时期用来加强中央集权的“九品中正制”

（在州设立“大中正”，郡设“中正”官），作了有利于加强世家豪族特权地位的修改，进一步控制了掌管选用官吏的大权。由他们把选拔的“人才”分成九等，按等次高下分别予以任用，并规定由世家豪族出身的官僚充任州、郡的中正，负责评定门第的高低和人才的高下，从此“九品中正制”变为世家豪族维护其特权地位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选官用人的唯一标准。他们根据门第的高低定官位品级的高下，随意发展自己势力。于是，出现了“公（三公）门有公、卿（九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一般的庶族地主），下品无

世族（世家豪族）”这种政权世袭、等级森严的门阀专政局面；另一方面，西晋政权还颁布了官吏占田（占有田地）荫客（占有佃客）的制度，规定官吏各以官品的高低决定占有土地和劳动人手的多少，世代作高官的世家豪族当然占有最高的数额。这样，汉代以来豪门大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的既成事实就得到了合法的承认，通过法权形式把他们在经济上居于垄断地位的特权也进一步巩固下来。世族门阀制度至此完全形成了。

东晋时代，世族门阀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东晋政权是在南北世族地主的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而世族门阀势力又有了进一步的生长。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分为北来的侨姓世族（即北方世族）和土著的吴姓世族（即南方世族）。北方世族，世代公卿，掌握军政实权，地位高于南方世族，特别是北方世族中的琅琊（山东诸城）王氏、晋阳（山西太原）王氏、阳夏（河南太康）谢氏、颍川（河南禹县）庾氏、谯国（安徽亳县）桓氏势力更为显赫。这几个家族轮番执政，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军政大权，“晋主虽有南面（皇位）之尊，无总御（统治权力）之实”，司马氏皇室不过是世家豪族操纵

下的傀儡而已。在世族门阀势力最为嚣张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重要官职完全由世家豪族垄断。他们不仅享有世袭的政治特权，而且还享有免除一切赋税徭役的特权，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和人口，过着极端腐朽荒淫的生活。东汉西晋以来逐渐形成的世族门阀制度，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在东晋世族门阀势力的腐朽统治下，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是十分尖锐。

造成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和强占劳动人口，对广大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的世家豪族纷纷带着自己的宗族、宾客、部曲（宗族、宾客、部曲是属于世家豪族的地主武装——平时生产，战时作战）逃到江南，其中赫赫有名的豪门大族就有百家。他们到了江南之后，为了重建家园，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凭借权势，疯狂地兼并土地，强占北方流民和南方土著为奴婢、佃客（佃客是租种豪强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身分略高于奴婢）。但江南地区的良田沃野，自东吴以来大部分为江东豪门大族所占有，已是“僮仆成军，田地布千里”了。土著的南方世族，不甘心南来的北

方大族在他们原来垄断的范围内任意发展，也拚命地扩充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与北方世族展开了争夺土地、人口的斗争。不管是南方大族或北方大族都用强占强买等方式千方百计地蚕食兼并自耕农民赖以为生的小块土地。东晋末年，有一个名叫刁逵的世族官僚，由于世世代代厉行兼并，在京口（江苏镇江市）的田产竟达万顷之多。在这些世家豪族疯狂掠夺土地的同时，又把魔爪伸向名义上属于国有的山林川泽，擅自霸占，据为己有，不许老百姓使用，老百姓砍柴捕鱼都要受到惩罚，打一网鱼就要被罚布十匹，致使“山泽之民，不敢食其小草”，这就使得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又断绝了靠以为生的来源。使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正如《宋书》所载：“（东晋时）权门（世家豪族）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为了求得活命，破产农民最后不得不被迫沦为豪门大族的部曲、佃客和奴婢，丧失人身自由，任其宰割奴役。此外，南北世族大地主还千方百计地强占劳动人手，甚至不顾封建政权的限制，私自隐藏大量的流亡人口，供其剥削奴役。

造成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又一重要原因，是由于

东晋政治的腐败和赋税徭役的繁重。在东晋世族门阀势力的腐朽统治下，政治非常腐败，整个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世族大官僚都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到了东晋末年，统治阶级的腐败更是达到极点。孝武帝司马昌明终日沉醉于笙歌舞宴之中，不理朝政。他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为了讨好孝武帝，征发民工数万名，在东府修筑了一座花园，一次就挥霍掉金银数万两。又如荆州刺史殷仲文生活极为腐化，他所用的车马器具都是“穷极奢丽”，由于他的财物太多，甚至把一些珠宝埋在地下，时间太长，化为黄土。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都被这些吸血鬼挥霍尽了。除了世族官僚和他们的爪牙们利用职权贪污盗窃、盘剥人民之外，当时世家豪族控制下的封建政权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也是十分繁重。当时占有大部分土地的世家豪族，非但他们自己“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而且东晋政权还给予他们以庇荫（占有）人口的特权，在他们庇荫下的依附人口，也是免除赋税徭役；另外，他们在合法的庇荫之外，还隐藏了不少人口，也同样是概不负担赋税徭役。这样，占有绝大部分土地、人口的世家豪族，便把一切繁重的负担全都转嫁到仅占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民身上。为了保证税

收，东晋政权曾经一度采取“度田收租”的办法，把过去按户按人口征税的户调制改为按田亩征税，每亩收税米三升，因受到世家豪强的抵制而失败。后来又恢复按人口征税的办法，不论土地多少，每年每人交税米三斛（音胡hú，古代量器，每斛十斗），后来又激增到每人五斛。此外，每户农民还得缴纳布帛作为户调，还有别的苛捐杂税。在租税重重的沉重负担下，迫使贫苦农民卖儿卖女，痛苦不堪。东晋时期的徭役更是繁重，官府修城筑路、建筑庙宇房屋、转运货物等都是征发民工。封建统治者和世族官僚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也是不停地征调民工从事修建，今日征伋、明日征役，弄得民不聊生。当时人范宁说：“今之劳扰（现在人民负担的徭役太重），殆无三日休停（一年之中没有休息三天），至有残形剪发（迫使人民剪发出家为僧），要有复除（要求不负担徭役），生儿不复养举（生儿不敢抚养），鳏寡不敢妻娶（中年丧妻的男人不敢再娶）”。在沉重的赋税徭役压榨下，迫使广大农民为了求得一线生路，纷纷外出逃走，或是逃到海岛，或是逃往深山，在外逃中病死饿死者无计其数。仅咸安年间（公元三七一年）至太元十四年（公元三八九年）十多年间，统计当时的户

口，就已经少了十分之三。仅仅永嘉（温州市）一地就有五百户逃到深山老林和海岛上去，过着风餐露宿的困苦生活。因而各地纷纷爆发反抗官府徭役的斗争。

由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引起的长期战乱，也是促使阶级矛盾激化的另一原因。在东晋世族门阀势力的腐朽统治下，不但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是经常爆发，在北方世族与南方世族之间，北方世族相互之间，南北世族官僚和司马氏皇室之间，矛盾重重，爆发过许多次争权夺位的斗争。比如晋元帝时有王敦之乱，成帝时有苏峻之乱，安帝时有王恭之乱，桓玄之乱。这些发动叛乱的世族大官僚，或是企图夺取皇位，或是企图消灭与其有矛盾的其他世族官僚。长期的战乱，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也是造成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之一，从而促使已经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就是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作为导火线爆发起来的。

东晋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还集中表现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加深这个问题上，随着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包括地租和赋税徭役）的日趋严重以及统治

阶级内部的长期混战，促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其中大部分沦为世家豪族的佃客、部曲和奴婢，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佃客）”的现象。当时世家豪族庇荫下的佃客、部曲，只为私家服役，既不承担封建政府的赋税徭役，也不自立户籍，而是“皆注家籍”，即把他们的名数按照规定注入到其所依附的主人的户籍中。这表明依附农民（佃客、部曲）和主人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不断爆发，各地农民纷纷破产，依附人口也不断增多。这就影响了东晋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当时东晋政权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不得不略加限制，规定：第一、二品官可以占有佃客四十户，以下每低一品减少五户，比起西晋时规定的数额增加不少。在世家豪族当权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只能是一纸空文，世家豪族实际上占有的依附人口要比规定超出许多倍；但从得到东晋政权合法承认的依附人口数字不断增加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当时封建依附关系加深的情况。由此可见，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加深，是东晋时代造成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各种社会矛盾（土地兼并加剧、赋税徭役加重、政治

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等)的集中反映,因而反对豪门奴役、争取人身自由,成为当时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这是他们反对东晋世家豪族腐朽统治的主要目的,也是这次农民起义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二、革命烈火,燃遍江南

东晋末年,在世家豪族门阀势力的腐朽统治下,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随着封建剥削、压迫的不断加深,农民反抗斗争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逐渐汇集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

公元三八九年(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正月,被世家豪族逼得走投无路的彭城(江苏徐州市一带)农民刘黎聚集几百名阶级弟兄首先走上了官逼民反的道路。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冲进县城,镇压了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分了豪门大族的粮仓,刘黎自称皇帝,在彭城附近的皇丘建立起农民政权,揭开了东晋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刘黎起义的第二年八月,永嘉(浙江温州市)人李耿举兵起义;到了公元三九三年(太元十八年)司马徽又带领贫苦农民几百人在马